

那句“添麻烦了”带来的麻烦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9月21日—9月27日)

1972年9月2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田中此行,被认为是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石,有赖此行打下的基础,中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一段蜜月期。不过,如果仔细深究,你会发现中日双方今日闹僵到如此程度,其实也与当年田中访华的一个细节有关系,那就是田中角荣

一句“给中国人民添麻烦了”所引来的道歉风波。

由于中日之间近代那段躲不开的恩怨史,在恢复邦交时对华进行道歉是田中之行的“必选动作”,但就是在这个“必选动作”上,田中捅了娄子。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田中是这么说的:“(在侵华战争期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为了便于译员口译,田中的致辞按意群断开,每段间隔之后,都响起预期的热烈掌声。可“麻烦”一句既出口,台下却安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国会讲坛上以雄辩著称的田中,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后半段的内容像照本宣科,显得有些僵硬。

田中这句“给中国人民添麻烦了”,引起了中方多大的愤慨,从周恩来总理事后亲自对日方提出的抗议中就可可见一斑。周恩来说: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所幸的是,由于当时的大环境,这段“添麻烦”的风波就在田中首相相对文章措辞稍作修改之后被一带而过了。

然而,这个当年的小细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却久拖未决,最终成了危害中日关系的顽疾。国家间的外交和与人相处一样,怎样道歉的确是门大学问。今

天的中国人往往羡慕德国对二战真诚的道歉态度,但其实德国战后的道歉也是有毛病的。德国今天无论官方和民间,道歉的主题都是“不该杀犹太人”,有些激进的俄罗斯人就对此有意见,说当年德国在俄罗斯也没少杀人,凭啥就一笔带过了?然而这种诘问在欧洲没有成为主流,究其原因,是因为德国在道歉这个问题上与其受害国达成了某种“共识”,双方都默认以这种方式道歉能取得谅解,互不就不细节抬杠,之后的事情就好商量了。而这种“共识”之所以能形成,与勃兰特当年在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天一跪不无关系。

反观中日之间恩怨,拜田中的那句“添麻烦了”所赐,这种“共

识”在中日之间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之后几十年,日本历任首相的所谓道歉,从铃木善幸的“过去在选择上的重大错误”,到中曾根康弘的“对过去的严厉反省”;从竹下登的“先前大战的不幸事件”,到海部俊树的“对我国的行动,日本全体国民当深深地反省,抱有正确的历史认识是不可或缺的”;进而到“河野谈话”、“村山谈话”。但我们中国人在听到这些道歉时,心中还是会觉得这些说法跟“给中国人民添麻烦了”一样,不够真诚。

如果田中当年能像勃兰特那样干脆一点,今天中日之间的故事是否会又是另一番光景呢?历史不允许假设,它为我们留下的只有一声喟叹。

印度独立敲响大英帝国“丧钟”

9月19日,苏格兰独立公投以独立派的梦碎而告终。英国人居然如此轻易地就让其领土中的一部分人去商量自己的独立问题,英国这种在我们看来殊不可解的执政思路早已有之。

1945年9月21日,英国宣布允许印度获得独立地位,这时间点可以被看做是英国“自我肢解”的起始点。从那以后,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一点一点放弃了自己海外的领土,“主动”沦落到了今天连“联合王国”的头衔几乎也保不住的地步。



2012年8月15日,印度姑娘庆祝独立65周年。

本报记者 王昱

过于“随便”的解体

要说明印度对英国来说曾经何等重要,讲讲“大英帝国”这个名称咋来的就不难理解了。1877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为印度皇帝。至此,“大英帝国”才正式成为英国及其所有殖民地的正式称呼。在此之前,英国在欧洲只是诸多王国中的一个,混得再牛也只是个王国,只有在占据了印度的领土后,英国才一跃拥有了帝国的体量与实力。摊开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版图,会发现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几个白人自治领地外,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几乎都是为了拱卫从英国本土到印度的航线所设立的。印度被英国人骄傲地称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没有印度的存在,“大英帝国”可以说国将不国。

然而,这样重要的一片殖民地,英国人却在1945年将其主动放弃。当年9月21日,刚刚上任不久的英国首相艾德礼发表声明,宣布英国将同意印度独立。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突如其来的,虽然英国与印度独立主义者的前曾经达成过协议,同意印度在

帮助英国取得二战胜利后取得独立地位,但恐怕连印度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英国会如此迅速而爽快地履约。综观历史上其他世界性的大帝国,哪一个帝国不是在折腾许久,闹了个天昏地暗之后才不情愿地退场的?与之相比,英国对印度的放弃,给人的观感不亚于今天的苏格兰公投——“太随便了”。

被请来的掘墓人

曾经在印度皇家警察任职过的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对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曾有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评价,他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但没有给英国的统治添麻烦,反而使其统治更为容易,因为甘地“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引发争执的行动”:“严格说来,甘地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是英国人的敌人,但因为他在每次危机中,甘地都会挺身而出,制止暴力——从英国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印度人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所以,他被英国人认为是‘自己人’。英国人在私下里也都承认这一点。”

更有甚者,奥威尔还进一步评价说:唯有英国治下才能产生甘地,这需要集会权利等保障群

众运动的形成,进而吸引外界注意;“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地,他能干成什么事?只有当非暴力抵抗的观念碰巧同时降临到俄国民众的脑子里时,俄国民众才有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即便如此,从乌克兰饥荒的历史来看,那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事实上,英国对甘地的态度可能比奥威尔说得还客气。1931年,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夏伊勒陪同甘地到英国参加圆桌会议,描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细节。夏伊勒说,火车一到伦敦,就有专车前来迎接,英国印度事务部的官员给甘地当司机,汽车抵达宾馆时,即发现几百人伫立在大雨中等候,宾馆大厅里更是聚集了来自议会、政府、国王、教会、工会、新闻界的1500多人。甘地在这种众星捧月的氛围中发表了演讲,煽动英国民众向政府施压,支持他的印度独立主张。

的确,甘地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但这个掘墓人却是英国人自己请来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英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亚当·斯密的账单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西雷曾这样描述大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

半个世界”。的确,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斩钉截铁”地推进自己的“大国梦”不同,大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大英帝国领土的扩张,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无心之举”,比如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其实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当地不断做大而完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人对建立一个大帝国的是否对自己有利,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拿定主意。

事实上,在整个英帝国扩张的时期,英国国内知识界就一直存在着“小英格兰主义”的思潮。支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大多为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从殖民地获得的经济利益与国家需要在殖民地进行的投入相比根本得不偿失。这一派观点的老祖宗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说英国1765年为了从美洲殖民地身上揩油,搞出了个“印花税法”,结果闹得民怨沸腾,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但最终收上来的钱十分有限,只有区区11万英镑。而就在此前不久,英国为了保卫该殖民地,刚跟法国打了一仗,军费是120万英镑。因此建立一个大帝国的,也许能为国王和贵族赢得荣耀,

让军人获得战功,让特许商人赚得盆满钵满,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绝对是一桩赔本买卖。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除了虚幻的荣光之外,只意味着更重的税收负担。

随着英国20世纪政治话语权逐渐从贵族转移到平民手中,“小英格兰主义”在英国越叫越响,普通民众对于给自己带来不了多少利益的“大英帝国”愈发丧失兴趣。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当年,民众通过投票的方式将发誓“不给大英帝国安排葬礼”的丘吉尔选下了台,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建立“福利国家”上。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主动卸下印度这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对于这个已经无心追求华而不实的“帝国梦”的国家来说,这块宝石虽然美丽,但过于沉重了。

从曾经占领半个世界的大帝国,到今天差点连家门口领土都保不住的小王国,英国的现状看似很“悲惨”。然而,我们不应忽视的是,正是靠着从海外殖民地那里抽回的精神,英国在战后的70年内完成了自己“福利国家”的目标。“大英帝国”的确死了,英国人却活得更好。